

两岸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同一与变异

——一项“文化基因”的检测

游国龙

内容提要 情感模式主导了人类的行为,并且决定其行为的观念,文化基因遗传的关键就在于情感模式的精确复制。通过对两岸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检测后发现,在亲属关系场域的人、物、价值理念中,两岸民众仍然投入了浓厚的感情,情感模式表现出同一性。当局因政治需要进行宣传的内容,是情感模式的差异所在,属于文化基因的不同变异,已成为现今两岸之间矛盾的根源。应当舍弃“组织体”侧面,以“文明体”来解决两岸问题,促进交往,使两岸民众在血缘上、情感上相互融合,成为彼此维持心理社会均衡方式中的一部分。目前,以“恋家者”来描述中国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特点仍是合适的。这个文化基因的检测工作,也验证了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情感模式 文化基因 融合 两岸关系

两岸的中国人本具有共同生活方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为两个地区,大陆由共产党所领导,台湾则被国民党控制。国共两个政权受不同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采取不同经济体制,在经过了半

* 游国龙: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 感谢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美中问题研究所主任葛小伟(Peter H. Gries)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对本文的建议。本文得到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印度人对中国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认知研究”(编号:13KDA002)资助。

个多世纪后,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否还具有可称为共同“文化基因”的东西?^①两岸中国人是否还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方式?人这个物种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几百万年,是因为先天的基因与后天的文化(社会遗传)能面对环境做出适宜的反应。近代西方入侵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两岸中国人难道为了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得中国文化的基因发生了改变(演化或者变异)。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两岸问题迟迟找不到较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是的话,这种文化基因的演化进程及其变异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办法检测出来?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关键。如果两岸之间还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可以从共同点的角度讨论两岸前景,也可以从变异视角寻找两岸问题的症结。此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无论从理论或现实意义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心理投射的原理,设计不同的文化情境,测量两岸民众的情感反应,借以厘清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及其变异。

一、研究设计

(一) 中国人的情感模式是什么?

文化基因遗传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情感模式”的精确复制。人出生后,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的生殖细胞中完成世代相承的心理遗传。情感模式的研究就像遗传学研究生物的生殖细胞及其遗传密码,以了解整个物质遗传的过程一样。情感的成分是感觉,如爱、恨、愤怒、绝望、忍耐、同情、希望、疏离、焦虑、克制、忠诚、背叛等,指的是人的内心感受。它决定人们选择做什么(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做这件事有何意义、对所做的成果是满意还是失望,影响人的价值判断。情感另一方面的性质,是非理性、不可计算、变化缓慢的。许烺光(Francis L. K. Hsu)认为,情感模式绝对主导了人类的行为,并且决定其行为的观念。^②情感模式是许烺光心理文化学的关键词。他提出情感模式解释人的行为,并不是强调情感比理性更为重要,而是认为人的情感模式主要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塑模,从而影响行为模式,形成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研究的心理分析学派认识到人的心理受文化的塑

^① 1981年威尔逊(Edward Wilson)与物理学家卢姆斯登(Charles Lumsden)提出了文化基因(culturgen)的概念,作为文化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基本单位。在英语世界里,如今更多使用道金斯(R. Dawkins)类比的“gene”发音提出的“meme”(中文译为“模因”)。笔者借用这个概念但不认同基于这个概念建构的文化进化理论。该理论存在的问题,可参见游国龙:《模因学与温特建构主义进程理论:文化选择的剖析与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8—136页。

^② Francis L. K. Hsu, *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s: Magic, Science, and Cultur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No. 11,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Preface VII.

造后,提出了文化模式、^①基本人格、^②众数人格、^③国民性等类似的概念,解释影响人的行为。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人在婴幼儿时期所遭受到的独特经验,以至在解释因果关系时受到严厉的批评。^④ 而许烺光以情感人假设为基础,对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整体性比较研究,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那么,许烺光说的中国人的情感模式是什么?在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Psychosocial Homeostasis)中,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就是不同情感模式造成的。他把情感模式的原理精炼为一个理论的内涵。图1是中国人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被称为恋家者,它的特点是第三层特别饱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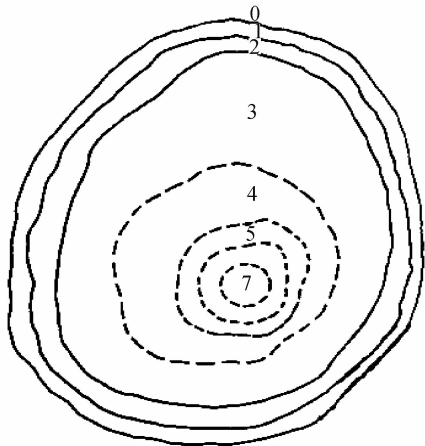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型:恋家者

第三层称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它包括投注了浓厚的感情,可称之为“亲密之人”、“执着之念”与“心爱之物”的人、价值理念与物品等。饱满的第三层意味着中国人较容易获得心理社会的均衡。对不同社会的每个人来说,最先占有第三层的人必然是父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加入不同的人、物品或价值理念,然后一些原有的内容则会被置换。在欧美,父母经常被配偶取代,成为第二层“运作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的一部分。父母仅仅在需要时,才作为可利用的人出现

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Ralph Lint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London: D. Appleton-Century Co., 1945; Abram Kardiner and Ralph Linton, *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the Psychodynamics of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③ Cora DuBois, Abram Kardiner, and Emil Oberholzer, *The People of Alor: A Social-Psychological Study of an East Indian Island*,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44.

④ 详细问题请参见游国龙:《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刀〉与〈家元〉为例》,《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第101—114页。

在生活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文化理想规定一个人的成就与未来都与家庭这个初始团体紧密相连。因此,父母、兄弟姐妹包括一些近亲在内就成为中国人第三层永久的居民。这群人可以与他分享荣耀,也可以在他失意时安慰他。另外,中国人投入情感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物品等也往往与亲属场域相关。孝道成为所有道德的基石,对老家、祖屋有深深的依恋,而所有的习俗都不鼓励一个人远离亲族,到外部世界去探险。

总的来说,许氏认为,中国人情感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投入浓厚感情到亲族组织中,一切社会上的人、事、物、理念,都必须顺应亲属间关系,与之相配合。例如,最具排他性的夫妻关系也要遵循其安排。个人情爱不被重视,为确保世系(lineage)的延续,多偶制是被允许的。由于中国人过于专注亲属间关系,涉及公共领域的事务也被忽略了,对国家、政治人物、政权(属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的第二层)表现冷漠。为此,许烺光将中国人的文化理想总结为“人际之间的彻底和谐”,强调相互依赖,表现出一种情境中心的心理文化取向,不同于美国人的文化理想“个人完全自由”,强调自我独立的个人中心的心理文化取向,也不同于印度人的文化理想“人与终极实在合一”和偏重单方面依赖的超自然中心的心理文化取向。^①

(二) 中国人情感模式的检测

许烺光关于中国人情感模式的阐述,是通过与其他社会(美国、印度、日本)比较得出来的,仍只能说是一种假设。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相互联系的三点:(1)对近亲集团投注的情感最多;(2)对政治、国家、领袖人物等亲属集团以外的事物较缺乏情感投注;(3)在对待性、爱情、婚姻的态度上,由于更强调集团的和谐而趋于忽视爱情。这种假设是几十年前做出的。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许氏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在今天是否还有效?^②一个族群的情感模式相对稳定,类似生物体的基因不那么容易变化。如果许氏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今天仍会在两岸中国人身上有所表现。假若以现今两岸中国人对其进行检验,在历时性比较方面表现出差别,那显然是中国人的情感模式发生了变化,对中国大陆与台湾进行横向的比较就可以找出变化的不同差异。反之,如果历时性比较没有表现出差别,那么,也可以了解两岸中国人情感模式的相似之处。第二,关于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假设能否通过某种检测手段加以检验?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测量人的情感反应是极其困难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安排真实的情境观察人的情感反应,也缺乏能够准确测量出人的喜悦、愤怒、尴尬、害羞程度的仪器,只能采取一些

^① Francis L. K. Hsu, *Clan, Caste, and Club*,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3, p. 9.

^② 他在1953年便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人与美国人》。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Inc., 1953.

技术性的手段来完成目标。心理学家采用观念投射的方法,设计不同的情境,让受测者根据情境做出判断和选择,借以提高研究的效度。笔者尝试采用这种方法,利用情境模拟(simulation)的方法,把许氏关于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假设转换成问卷,通过不同文化情境间的相互比较,分析受测者在给定情境下的选择和判断,以确定感情的投入方向。笔者拟设计三种类型的情境进行比较。

首先是一般情境。这个情境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加入特定文化情境后的反应参照,它是比较的基础。笔者预期两岸民众对这方面的情境不会有强烈的反应。

其次是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三层内容设计的情境。它是测验的核心,包括对亲属集团的态度、对亲属集团成员的态度、对性的态度。笔者预期两岸民众对这方面情境设计的事件会有强烈的反应。它可与第一部分的一般情境做比较,也可与第三部分的情境做进一步的比较。

再次是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二层“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内容设计的情境。它测验的是两岸民众对于亲属集团以外事物的态度。笔者预期两岸民众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

进行这三个层次比较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发现真正会激起强烈情感反应的内容,它是人的一种惯习(habitus),无需进行思考加以判断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达到比较分析的效果。比较分析法是许烺光提出针对人类情感与行为进行量化研究的方法。^① 定量研究一般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但对于人类的情感与行为进行这样的统计分析有很大难度。许烺光主张通过比较方法来进行。如果说情感模式的精确复制是文化基因能够顺利完成遗传的关键,那本文所要做的就是一种类似基因测序的工作。但文化基因的检测不像生物基因那样可以用仪器操作,而只能通过精心的情境设计、基于经验的观察及适当的比较方法进行。不可否认,上述三种情境的比较可能还称不上是精确的量化分析,只能说是笔者所能做到的寻求一种研究文化基因的量化方法的努力。

(三) 研究工具设计

1. 情境模拟问卷设计

由于不能够安排真实的情境进行测验(这涉及了研究伦理的问题),笔者试着把文化情境转换为文字叙述进行比较。举例来说:

1. 如果有一天你们全家出门旅游,回家之后发现被小偷光顾了。清理之后,发现没有丢失贵重物品,只是大门被破坏了,你感到多愤怒?

2. 如果有一天你们全家出门旅游,回家之后发现被小偷光顾了。清理之

^① Francis L. K. Hsu,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ts Importance and Pitfalls*, *Newsletter of Chinese Ethnology*, Taipei, Taiwan, No.18, December, 25, 1982, pp. 1-8.

后,发现没有丢失贵重物品,只是大门被破坏了,由于小偷没偷到钱,气愤之下却将你家供奉“祖先的牌位”砸坏了,你感到多愤怒?

在这两道试题中,首先安排一个家中失窃的情境观察受测者的反应,紧接着把“祖先牌位”作为对亲属集团情感投注的重要意象进行比较。对许多大陆人来说,“祖先牌位”或许显得过时、陈旧,但在台湾,家庭中摆放祖先牌位仍是很常见的。如果许烺光关于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假设正确,我们预期两岸民众对这一情境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另外,笔者还设计了另外 10 个题,共 12 个问题作为第一组题,其目的是为了检测中国人对亲属集团内人与人关系模式,包括兄弟间应有的态度、对父母的态度、对生育下一代的态度等等。根据假设,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在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情境中心取向等特点,如果假设正确,受测者对安排的文化情境会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反应。反之,则会像一般情境的反应一样。

第二组题包括 13—17 题,它的设计与中国人对性的态度有关,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中国人在哪方面受到约束。再以 13 与 14 题为例来看:

13. 如果你和好朋友(同性)坐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播的正好是李安导演的“色戒”(你们都不知道剧情将会是什么),结果到了一半出现了梁朝伟和汤唯大胆、暴露而且相当长的做爱镜头,请问你感到多尴尬?

14. 如果你和父母坐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演的正好是李安导演的“色戒”(你们都不知道剧情将是什么),结果到了一半出现了梁朝伟和汤唯大胆、暴露而且相当长的做爱镜头,请问你感到多尴尬?

设计的变量由“同性好友”变为“父母”,是为了观察不同情境下的情感反应。传统中国人对性的态度不是压抑,它被认为是正常的情感,可以在合适的地方释放。如果关于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假设正确,可预期受测者会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反应。反之,则不会有太大的情感反应。

第三组题包括 18—29 题,它设计的目的在于测验中国人对亲属集团以外的人、物、事的态度,涉及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第二层的内容。例如以下几题:

18. 如果现在社会发生动乱,改朝换代,你感到多伤心?

19. 如果你父母在社会发生动乱时,不幸去世,你感到多伤心?

甲 20. 如果现在改朝换代,执政者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走“资本主义”路线,你感到多愤怒?

乙 20. 如果现在社会发生动乱,改朝换代,国民党宣告倒台,你感到多伤心?

如果假设正确,中国人对政治是冷漠的,则可以预期受测者对于这些情境不会有激烈反应。对国家、对政治的态度是情感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当前两岸

困境的深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情感模式假设,中国人主要把情感投注到亲属集团上。如果假设正确,则两岸中国人对国家、政治冷漠。这或可提供解读两岸政治困境的心理文化因素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然而,鉴于当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台湾,牵涉到政治、政治的话题都是相当敏感的,这对试题的设计者提出了巨大挑战。但不论是把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日本人统治、美国人统治、俄国人统治作为变量,都只是设计为一种具有相同意象的投射对象,没有特别的政治意涵。

最后一组题包括 29—32 题,设计的同样是中国人对亲属集团以外的人、物、事的态度,但它们都与政治问题不相关。如果假设是正确的,预期受测者对这方面的内容不会有强烈的情感反应。例如第 31 题:

31. 如果你现在去了英国,发现他们都是靠左行,要你改变你的右行习惯,你是否能够接受?

由于两岸在习惯用语与社会制度方面有些差异,为提高研究效度,在情境设计上也做了细微的调整,测试时分为甲(大陆)、乙(台湾)两个样本。“甲 22A”、“甲 23A”两个情境是甲样本的设计,“乙 20A”、“乙 23A”则是乙样本的设计。

2. 情感反应的量化

受测者面对情境变量所产生的情感反应,需要以客观的方式记录下来。笔者设计了一个情感反应表,将情感反应从“没有反应”到“极度反应”,量化为“0”到“100”,并区分为“100”、“80”、“60”、“40”、“20”、“0”等六个量级,以“A”、“B”、“C”、“D”、“E”、“F”为代号,辅以“极度”、“特别”、“相当”、“很”、“一般”、“无所谓”等程度副词,让受测者客观判断自己的情感反应程度。必须指出,人类的情感反应很难做合适的量级划分,而且每个人的性格差异(如易怒、乐天)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强度也会有差异,甚至“极度”、“特别”、“相当”、“很”、“一般”、“无所谓”这些程度副词的内涵也不一定能够相对应 A、B、C、D、E、F 等几个量级。可是,如前所述,这个测验是通过比较来完成的,尽管它不能得到一个精确的数据,但还是能够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测验结果。情感反应表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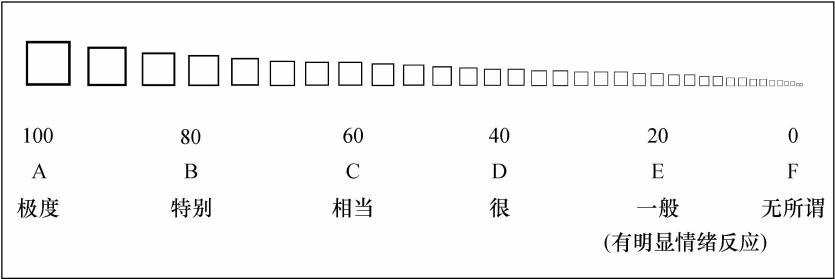


图 2 情感反应表

3. 数据分析与样本成分设计

最后要考虑的是如何进行分析。笔者以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PSS) 软件进行,利用“平均值”(mean)计算受测者的平均感情反应,以“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观测情感反应的离散程度。由于这不是一般的定量分析,主要是通过比较达到一个客观判断的效果,所以计算这两个值已然足够。在这个测验中,平均值越高者,代表情感反应越强烈;反之,则代表没有情感反应。标准差越高者,代表情感反应越不一致,反之,则代表反应趋于一致。

在样本的成分组成方面,大陆方面(甲样本)设计性别、出生年份、出生地、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六个成分,台湾方面(乙样本)则设计五个成分,“民族”取消,政治面貌改称“党派”。这是为了达到更适当比较的目的。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 研究程序

研究程序可分为抽取样本、搜集资料及统计分析三部分来说明。大陆方面为甲样本,取样主要是来自各省在北京求学、谋生的一般民众;台湾方面为乙样本,取样来自在台北求学、谋生的民众。测试时间是2010年7、8、9月。为了兼顾总样本在年龄、地域的分布,测试工作分为团体测试与抽样两种方式进行。团体测试主要针对大学在校生,在台湾选择了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以及暑期在“教育家文教机构”进修英文的学生;在大陆方面则选择了北京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由笔者或笔者委托的测试者利用上课空档进行测试。测试无任何时间上的限制,但在15分钟之内受测者大致完成了测试。随机的抽样测试方面,则是在大街上寻访受测者,愿意接受测试者,发一份小礼物作为回馈。总共发出了653份问卷,回收610份问卷。在资料搜集完毕后,即进行废卷处理工作,结果获得573份有效问卷。

(二) 受测样本

鉴于年龄太小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测试对象要求年满18岁上,并有一定读写能力。实际受测者,甲样本284人,乙样本289人。甲样本男性人数占全部受测者的43.7%,女性占56.3%。年龄30岁以下占89.7%,其余则在30岁以上。党员占12.3%,团员占70.7%,其余为无党派人士。教育程度大学本科以上占86%,大专占10.5%,高中占1.7%。汉族为大多数,达92.9%,其余为各民族。出生地在北京者仅23.9%,全国各地占76%。乙样本男性人数占全部受测者的44.6%,女性占55.4%。年龄30岁以下占52.9%,30—40岁占33.2%,40岁以上

占13.8%。无党派大多数,为90.3%,民进党员1人,国民党员7人,其余未回答。教育程度大学本科以上占72%,大专占13.4%,高中以下占14.4%。出生在地台北者占49%,其余为51%。

此样本数虽不算大,但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数据库,而是测量情感反应强度,且在计分的过程中发现,以100人为基数所统计的结果与200人,乃至最后的结果都没有太大差别,可推测增加样本数无助于提高信度。尽管测试点仅分别各选一地,但北京与台北是开放性的大城市,其人口构成来自全国各地,仍可视作为代表性的样本。

(三) 结果分析

根据情感反应表将受测者的答案转换为100、80、60、40、20、0等数值,计算每组的平均值与标准差,然后,依其性别分组再进行计算。平均值最高者,甲样本为第19题81.97,乙样本为第30题88.07;最低者同为第34题,分别是12.18与11.5。标准差最高者,甲样本为第23题28.4,乙样本为第23A题29.09,最低者同样为第31题,分别是10.78与11.34。依据设计的情境,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12题是一般情境与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三层内容设计的情境的比较,涉及对亲属集团及其成员的态度。甲乙两个样本测得的平均值与标准差极其类似。与一般情境相较,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三层内容设计的情境平均值高了20以上至30多不等。至于标准差普遍在20上下,受测结果显示出一致性。

第1题设计的情境是家中遭窃,第2题的情境变量是祖先牌位被破坏。在台湾,许多民众家里设有祖先牌位,而且日常的祭祀也相当频繁,故乙样本第2题的平均值达到了73.86,反映出台湾民众对祖先牌位投入浓厚的感情。而大陆北方,特别是在城市里,许多家庭都没有祖先牌位,祭祖活动也较少,但令人诧异的是,甲样本第2题平均值同样达到了71.41。而且与第1题判断基准题相较,平均值差高出33.86,显示出对祖先牌位也相当在意。第4题设计的情境变量是与人发生争执,哥哥不但没有帮助自己,反而还向着外人。两岸民众对此均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平均值达到了72.11(甲)与79.43(乙)。与第3题仅仅是哥哥置之不理相较,平均值差高出了22.6(甲)与21.79(乙)。第6题设计的情境变量是弟弟功成名就后,不知回馈父母,两岸民众对此均感到十分不满。甲样本平均值达到了77.88,乙样本达到了79.21。与第5题弟弟认为成功是因为自己的努力相较明显为高,达到35.2与34.78。第8题设计的情境变量是遭受到知心好友(异性兄弟)的陷害,平均值达到了79.01(甲)与80.21(乙)。与第7题受到一般人陷害相较,高出了21.97与22.5。第12题设计的情境变量是父母去世,来不及看到自己功成

名就,对此,两岸民众都感到非常遗憾,平均值达到 73.31(甲)与 73.86(乙)。与第 7 题没有取得成功相较,高出了 23.38 与 22.72。在这一部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第 9 题与第 10 题的情况。

9. 如果你父母早逝,没有机会陪伴你长大成人,你感到多遗憾?

10. 如果你父母早逝,没有机会陪伴你长大成人,而你结婚后也没能生得半子,陪你终老,您感到多遗憾?

相较于第 9 题无父无母的悲惨状况,第 10 题又加上了无儿无女的情境,两岸民众对此均感到非常遗憾,甲乙样本平均值分别达到了 76.83 与 75.57。但这一个测试平均值只比第 9 题分别高了 13.3 与 9.5。这个差距是这部分测验中最小的。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第 9 题的情境“无父无母的童年生活”已让受测者感到足够的遗憾,所以对比于第 10 题所设定的变量“无儿无女”显得反应不够强烈。这些年,台湾由于生育率越趋于低下,从而衍生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大陆则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一直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从表面上看,台湾与大陆对于后代的要求是不同的,但这个测试结果表明,两岸民众对于后代的看法是一致的。一般人经常忽略了后代起到的心理文化作用,以为儿女只是担任传宗接代的角色,或者起到养儿防老的功能。实际上,在强调相互依赖的中国社会里,后代不只能够维系婚姻的稳定,还能满足人的“情感性安全”与“情感性地位”的需求。^① 通过经济上的举措,或许能解决养老的问题,但是心理上的安慰则不是金钱所能替代。故两岸民众对此均有强烈的情感反应。

13—17 题涉及的是性方面的问题,仍是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三层内容设计的情境。与一般情境相较,甲乙样本都表现出显著差别。但有一些题,甲乙样本测得的平均值较不一致,标准差也高。

第 14 题测试的是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在中国,性受到抑制,在亲子之间不是一个可以公开的话题,即使是见到亲热的镜头,还是会让人感到别扭,甲乙样本的平均值相当一致,都是 60 左右。但在好友之间性是可以讨论的,因此,13 题平均值只有 30 左右,甲乙样本也相当一致。

第 15、16 题甲样本平均值为 55.56 与 32.46,而乙样本仅有 34.29 与 19.86,差距为 21.27 与 12.6。这两题测试的是得知交往对象的性经验人数的感受,前者为 14 人,后者为 2 人,大陆与台湾民众不约而同表现出对 14 人经验数与 2 人经验数的差别反应。但这个测验结果还必须与第 17 题比较才有意义。第 17 题的情境是假定自己为交往对象的第一个性伴侣,但对方却持续与他人约会,甲乙样本的平均

^① 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 页。

值分别达到了 69.15 与 65.66,远较前两题反应更加强烈。这个测试结果表明,两岸民众对于男女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把性与婚姻视为必然的因果关系,即性关系(新式男女所谓恋爱)导致结婚,结婚导致生儿育女。他们不能接受只是为了恋爱而性,在这个问题上,性经验人数并不是关键,而在于把性与婚姻之间的关系看作什么。然而,这一个测试虽然支持了中国人的情感模式,但甲乙样本第 15 题平均值差到 21.27。这代表大陆民众对于丰富的性经验更不能接受,而台湾民众则显得不那么在乎。可是,大陆方面标准偏差也达到了 28.39,这说明民众的反应并不一致。这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详后)。

18—29 题涉及了国家、政治等方面的情境,测得平均值较低,远不如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三层设计的情境,而且标准差则较高在 20—29 不等,显示出反应较不一致。

第 18 与 19 题测试的是对于国家与父母的感情投入状况差异。甲样本分别为 30 与 81.97,乙样本为 35 与 83.14,平均值差距达到 51.97 与 48.14。这表明两岸民众对于父母的感情投入都要多得多,相较于父母去世,改朝换代并非什么大事。从第 19 题的标准差来看,只有 16.25 与 16.50,代表众人的看法相当一致。

甲样本第 20 题的情境变量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改变,第 21 题则是诋毁儒家思想,拆掉孔庙。二者相较,大陆民众似乎更不在乎社会主义道路的改变,第 20 题平均值为 23.87,第 21 题为 46.76。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湾民众身上。相较于国民党倒台 22.71(乙 20)与民进党倒台 18.79(乙 20A),乙样本第 21 题测得的平均值为 46.64,与甲样本相当。这表明,虽然国民党曾经在台湾长期执政,但民众对它的感情投入与民进党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进一步说,台湾民众对于政党根本缺乏感情投入,它们的倒台都不会引起太大的感伤,反倒是对于儒家思想投入了更多的感情。

第 22、23、23A 题的情境涉及异民族执掌政权,变量分别是日本人、美国人与俄罗斯人。甲样本的平均值达到了 69.86、58.10、60.99。这表明大陆民众根本无法接受异民族的统治,不论是日本人、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为了进一步比较大陆民众的感情投入状况,在第 22A 之中还加入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变量,由实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日本人执政,但仍旧没能够缓和大陆民众的情绪,平均值高达 67.04。这显示出相较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对日本人的痛恨情绪反而更强烈。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里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第 18 题的测试结果。第 18 题显示出中国人对国家很少投入感情,故对于改朝换代并不感到伤心,因此,即便改由异民族统治不应感到不能接受才是。对比于乙样本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乙 22. 如果现在改朝换代,改由“日本人”执政,你感到多愤怒?

乙 23. 如果现在改朝换代,改由“美国人”执政,你感到多愤怒?

乙 23A. 如果现在改朝换代,改由“共产党”执政,你感到多愤怒?

乙样本对于 22 题(日本人)与 23 题(美国人)的平均值只有 39 与 32.64,这个结果表明,台湾民众对于异民族执政的反应并不那么强烈。这支持了第 18 题的测试结果。可是,乙样本对于第 23A 题共产党执政这个变量的反应却相当强烈。尽管笔者在第 23 题之中,并未说明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如台湾组成的共产党,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共产党,但是由于过去的国民党与最近民进党对大陆共产党的诋毁,导致台湾民众对“共产党”这个名词相当反感,他们不能够接受共产党的执政,平均值达到了 50.64,甚至比异族统治都要高得多。台湾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对于日本人这个变量反应却只有 32.64,共产党未曾对台湾进行过掠夺平均值却高了 18,这个现象值得深思。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更注意家庭与宗族,一般人都把感情投入到围绕着亲属场域相关的领域之中,以至于对国家与社会缺乏感情投入,因此,当遇到朝代更替时,中国人不是特别在乎。但是,价值观是可以通过外力来模塑的,所以,当执政者对某一方面不断强调的时候,仍旧可以造成一种共同心理。相较于台湾,大陆更注重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于日本侵略的宣传几乎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对日本人的看法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是否正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人、美国人与俄罗斯人的测试不符合第 18 题的基本假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合适的对比是台湾对共产党的态度。台湾当局的负面宣传,再加上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台湾民众始终把“共产党”当成负面的象征。他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缺乏正确认识,经常把它与经济上的均贫、政治上的专制、暴力统治相联系,所以对共产党怀有一种恐惧,故以共产党作为变量,测得平均值相当高。这一点从标准差可以得到证实。甲样本第 22、22A、23、23A 分别达到了 28.26、28.15、28.39、26.62,乙样本第 23A 也达到了 29.09,是所有测试中最不一致的,这代表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感情投射方向,导致众人反应不一致。如果是基于中国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三层设计的情境,平均值会更高,标准差将更低,就像是第 19 题的结果所显示出的。另外,从性别分组来看,也能找出一些解释。在这些测试中,不论是甲样本或乙样本,男性的反应均较女性高出不少。特别是在日本人的执政问题上差距更高达 14.27。女性基于本能,对家庭婚姻更为重视,故在政治问题上没有表现出男性那样关注,所以平均值较低。

第 24 题的情境变量是由执政者的儿子当接班人,甲样本平均值达到了 50.56,而乙样本只有 23.64,平均值的分差达到了 26.92,是这一部份测试中表现出最大差异者。

24. 如果现在改朝换代,执政者决定指定他儿子当接班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成为一代明君的资质),其余社会、经济制度不变,请问你感到多愤怒?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寻求解释。相较于大陆,台湾民众可以说获得了更多的

政治权力,但台湾民众对于执政者决定由儿子当接班人这件事,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反应,反而是大陆民众更不能接受。这也许是大陆民众对于官员腐败带来的社会不公感到不满,以及“官二代”表现出的负面形象所导致。他们可能担心父传子这种形式产生领导人会带来更大的贪腐。而在台湾已经出现过领导人下台入狱的情况,他们并不担心权力不受控制。

第25题的情境变量是硕士学位才有参与投票的权力,这是对于参政权的一种限制。甲样本测得的平均值为47.39,乙样本为40.93,同样是大陆民众表现出更为在乎的态度。可是,两岸民众对于这个问题,最多只达到愿意走上街头抗议的程度(即作答说明的D),不会为了争取这个权利而付出更多。第26题的变量是出版著作遭受审查,甲乙样本测得的平均值35.21与28.29。以西方观点来看,这个变量所涉及的是自由与人权的问题,但两岸民众都表现出不太在乎的态度。第27题的变量是限制组织政党,它涉及的是自由与民主的问题,但是甲样本的平均值只有32.89,乙样本也只有31.36。这个变量同样也没有引起两岸民众太多的关注。笔者进一步以集会与游行进行测试,虽然引起了两岸民众多一点的情绪反应,但也没有改变根本的看法。第28题平均值45.56(甲)与40.07(乙),第29题达到了40.93(甲)与38.50(乙)。

最后几题测试的是与政治无关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第二层的内容。甲乙样本测得的平均值与标准差相当一致,平均值相当低,两岸民众均未投入浓厚的感情,众人的意见也一致,标准偏差也低。

第30题设计的是判断题,以外籍配偶要求向父母收取租金作为变量,以便与最后三题比较。甲乙两个样本显示出的平均值相当高,达到了81.41与88.07,代表两岸民众无法接受西方人的这种做法。第31题测试的是交通规则的改变。两岸民众到了国外表示立刻可以接受“左行制”,测得的平均值仅为17.39(甲)与17.07(乙)。标准差则是本次测中最低者,只有10.78与11.34,意见相当一致。第32题测试的是信仰问题。两岸民众表示可以根据现实需要改变,测得的平均值为35.92(甲)与35.79(乙)。第33题的情境是加入社团的愿望落空,两岸民众表示不太在意平均值仅有22.18(甲)与20.36(乙)。第34题测试的情境是被问及薪资收入的反应。中国人并未将薪资收入与个人尊严联系起来,成为隐私的一部份。甲乙样本测得的平均值相当低,分别为12.18与11.50。这些题与第30题的平均值相较,有极大差距,最低都达到了46(甲)与53(乙)。

三、结 论

本研究利用心理投射的原理,设计不同的文化情境,测量两岸民众的情感反应,借以厘清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及其变异。测试对象为大陆与台湾年满18岁的民

众,实际测得 573 个样本。对测试结果的分析和相关思考如下:

(一) 概括性结论

测验结果表明,两岸民众的情感模式表现出同一性,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投入了浓厚感情于亲属场域中的人、物、价值理念。父母等近亲构成了他们情感上相互支持的“亲密之人”;与其相联系的物,如祖先牌位、祖坟、祖屋、田地等成为投入感情的“心爱之物”;孝、悌、义等相联系的价值理念成为他们的“执著之念”。这些投入浓厚感情的人、物、价值理念是他们情感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心理社会均衡的维持。当测验这部分的内容时,两岸民众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并没有把感情投入到西方传过来的那些美好的价值理念,如自由、民主、人权之中。诚然,两岸民众对它们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与投入情感相冲突时,两岸民众都无法在行动上与其相配合。所以,我们看到,台湾民众不论是面对国民党或是民进党的倒台都不以为意。大陆民众对于实施哪一种政治制度或者经济制度也没有特别看法。这也许是因为人的情感能量并非无限,中国人已投入浓厚感情到家族、宗族这些亲属团体之中,再也无力关心整体社会团体的公正与不公正,也没有改变这种关系的动力。

两岸民众的情感模式也存在差异,这主要是当局因政治需要进行的宣传,这是现今两岸中国文化基因的变异差异。可是,文化基因的变异与基因进化毕竟不同,它的形成与当局的政策有关。如果没有外力的持续影响,最终只是作为某一代中国人情感模式的特征而存在,不会在遗传中被精确复制。^①

需要注意的是两岸民众对于性的态度。从许烺光的优势亲属关系假说(Hsu's dominant dyad hypothesis)来看,中国是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美国是夫妻关系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两种亲属关系的主要差别之一就是“性”受到压制与强调“性”。^②台湾民众表现出更不在意的宽松性关系,意味着文化基因出现较明显的演化差异。大陆民众的测验结果,虽然表现出对宽松的性关系更为不满,但标准偏差也很高,这说明被试的反应很不一致。我们或可理解为一部分大陆民众也已朝着相同的方向演化而另外一部分尚未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会达到什么地步,目前还不能轻下断言。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仍有足够的活力因应外来挑战而产生情感模式的变化。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可以说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内核。两岸为因应外来挑战,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使得社会结构快速发生变化,但中国人

① 就像“反清复明”思想一样,当那一代人逝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会为此投入感情,牺牲生命。

② Francis L. K. Hsu, “The Effect of Dominant Kinship Relationships on Kin and Non. Kin Behavior: a Hypothe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67, 1965, pp. 638-661.

情感模式的变化却相对缓慢。迄今为止,两岸民众乃至现代的中国人与过去的中国人之间,可以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还是许烺光描述的“恋家者”。值得一提的是,此项研究的目的虽然在于比较两岸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差异,但实际上也验证了许烺光的学说。首先,验证了中国人的情感模式“恋家者”,如今以“恋家者”来描述中国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还是合适的;其次,这项测验是根据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设计的,它要测试的是,亲属成员是否仍是两岸民众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第三层的重要内容并投入了强烈感情,以及因而在其他方面缺少情感投入。测试结果支持这个假设。同时,该项测试还验证了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在解释人的行为方面的效度。

(二) 延伸意义讨论

情感模式是人们行为背后的原理,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对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人们的行为进行比较才能概括出来。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情感模式对一个国家或族群行为的影响是被忽略的。最近由尚会鹏提出的文明体、组织体之说,或可给予本文的探讨以学理上的支持。^① 情感模式记录在文明体中,可称为文化基因,它不易变化,并通过人对组织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大陆和台湾(部分主张台独的人除外)都不承认两岸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② 目前,两岸关系定位困境在于:无法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已有的任何概念来界定,只能用一系列否定概念表述,如不是国(民族国家)与国关系、不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联邦关系,也不是邦联关系等。从本文的测验结果看,这种困境可能源自人们对现有理论中“民族国家”概念的拘泥,采用文明体和组织体两个概念可能有助于摆脱这种困境。

两岸实属于同一个文明体下不同组织体的关系。测验结果支持两岸属于一个文明体的看法,而分歧和对立多集中在组织体侧面。但如今,处理两岸问题的焦点都在组织体侧面,如“一国两制”,“一国两区”、“一中两宪”等都是关于组织体侧面的讨论。可是,与这些方案相关的“主权”、“民族国家”等概论,产生于近代欧洲,是欧美人对于国家发展、形成与衰亡知识的总结与看法。以此来讨论两岸前景,好比是用欧美人处理家庭矛盾的看法,来解决中国人兄弟失和的矛盾。以文明体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有可能利用中国人的智慧,找到和平的解决之道。本文表明,中国人的情感模式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过去汉民族在东亚大陆这块土地与无数的民族上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中华民族。不可否认,中国人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尤其是在那些引发了中国人情感反应的事情上,冲突也非常激烈。过去诸葛亮就曾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不断发动战争。但朝着符

^① 尚会鹏:《人、文明体与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台湾最近的表述是2013年6月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期间多次强调两岸非国与国关系。

合中国人情感模式的方向这个思路出发,有可能为今日两岸困境找到出路。以“融合”为目标来解决两岸问题会是更好的选择。融合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为血缘的融合,^①其二为情感联系上的融合。可以创造更多交往机会促使两岸中国人成为彼此维持心理社会均衡方式中的一部分,在血缘上、情感上相互融合。

(三) 对研究工具和效度的检讨

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测验具有较高的量化客观性,计分与归类的可重复性较高,可以取得稳定的结果。但不能忽略,它也存在着一一些问题。

1. 尽管测试前要求受测者必须与判断基准题进行比较,但受测者有时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导致出现特殊的文化情境的情感反应比一般情境更弱的现象。举例来说,第9题无父无母的童年生活引起了受测者“60”度(相当)的反应,但第10题加入了变量“无父无母而且无儿无女”却只引起了受测者40度(很)的反应。这在逻辑上明显不合理。即便变量没有引发受测者更强烈的情感反应,但情感反应也应该与一般情境相同。凡出现这种情况,皆以废卷处理之。

2. 情感反应并不可能完全写在量表里。在一些问卷之中,受测者额外写上自己的情绪反应。例如,第20A民进党倒台的测试中,就有受测者写上“高兴”等字眼;再如,第1题家中遭窃,有受测者写上“害怕”。可见,遭遇到相同的事,由于认知不同,也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反应。

3. 目前设计的某些文化情境变量也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第13题的情境改成与配偶一同观看电视,以与父母相互比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第32题以父母亲得了重病为由去“基督教堂”进行祷告作为变量更为合适。

^① 王逸舟教授近年来主张的“创造性介入”对外关系思想,在解决两岸问题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血脉共同体”可以消弭对抗性不良基因的积极思想,是坚持对话与融合之决心的心理基础,也是在两岸现有政制不通用的情况下,“曲线救国”,保持联姻的一种文化符号。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